

库尔德人：除了大山没有朋友

■本报记者 孙 华

在跨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四国边境的广袤山区，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人口在4650万到4780万之间，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波斯、突厥的第四大民族，却始终没能独立建国。在民族意识觉醒的近百年中，他们屡遭欺压和背叛。他们，就是库尔德人。

“大库尔德斯坦”建国梦想终成泡影

关于库尔德的起源，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界定。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当时曾将本文开头提到的整个地区称作“库尔杜克”。一名法国学者认为，库尔德与库尔一词相关，后者首见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碑文，大意为“有工作的土地”。公元10世纪的伊朗著名诗人菲尔多西在其《列王纪》中记录了一个铁匠卡维起义反对蛇王扎哈克的神话故事，就讲到了库尔德人。大致是说，扎哈克为了使其肩上的双蛇平静下来，遵从魔鬼的旨意，每天杀死两个伊朗年轻人，取脑喂蛇。后来有两个伊朗厨师机巧地进入扎哈克的宫殿，他们每天放走两个年轻人中相对勇敢的一个，代之以羊脑。被放走的年轻人躲进大山，放牧为生，隐匿在岁月中。日后，这批勇敢的年轻人就被统称为“库尔德人”。

虽然菲尔多西讲述的是神话故事，但并非没有现实根据。由于野蛮入侵和其他部落袭扰，以及气温升高，导致一部分雅利安人躲进深山，从事狩猎和放牧。久而久之，他们被冠以“库尔提”的名号，意即“大山中的人”。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田人统治时期。所以，从历史地理和文学的角度，“库尔德”从诞生就与大山、勇敢等符号联系在一起。

只是，勇敢的库尔德人由于不断地被强族征服，始终没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统一的政权。在前伊斯兰时代，库尔德人生活的地区先后被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罗马帝国、塞琉古王朝、安息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征服并统治。伊斯兰教兴起后，库尔德人的地区被新兴的阿拉伯人横扫，库尔德人被征服后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在10-12世纪曾出现过一些库尔德人建立的王朝，但主要是统治局部地区的小国，随着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等强敌的入侵，也逐步消亡。

1171年，库尔德人萨拉丁建立了埃及阿尤布王朝，带领穆斯林从十字军手中重夺耶路撒冷，成为第一位埃及与叙利亚的库尔德族苏丹，却没有领导库尔德人自己建立王朝。之后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库尔德人的地区又从属于蒙古帝国，库尔德人再度完全由外族统治。

波斯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在1639年签署《席林堡条约》以结束多年战争，也确定了对库尔德人地区的瓜分，其中小部分归属波斯。奥斯曼土耳其一开始承认库尔德人16个公国和50个领地相对独立的地位，但随后态度转变，最后一个库尔德公国于1847年被消灭。

到了20世纪初，库尔德人试图在原来的聚居区建立自己的国家，即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被称作库尔德斯坦，是一个粗略的地理概念，库尔德斯坦这个名词更多属于历史文化范畴，直到民族意识觉醒，才被打上政治烙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920年8月签订《色佛尔条约》，规定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可以通过公投的方式独立建国，为酝酿建立“大库尔德斯坦”的库尔德人带去希望。但土耳其于

1923年7月以《洛桑条约》取代了《色佛尔条约》，将15万平方公里的库尔德人聚集区划到伊朗，8万平方公里的库尔德人聚集区划到伊拉克。

民族抵抗运动成为外部势力政治角力的棋子

现在的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在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东南部，虽一一接壤，却无法相融。四国边界阻隔了库尔德人，他们被称呼时要加上所在国家的前缀，这也阻断了他们“大库尔德斯坦”的建国梦想。

实际上，伊朗库尔德人曾成功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1945年10月成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受苏联支持，于1946年1月在伊朗西阿塞拜疆省宣布成立“马哈巴德自治共和国”，同年12月就被伊朗军队推翻。

现在约900万库尔德人在伊朗平静地生活，尽管在2004年出现了“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组织，但作为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朗的分支，实力和能力都很小。

除了伊朗，其他三国的库尔德人几乎没有放弃谋求自治的努力，也因此遭遇所在国政府的打压。

在土耳其，1925年-1938年爆发过三次库尔德人起义，凯末尔政府在镇压的同时，关停了库尔德人的学校、机构、出版物和宗教场所。之后历届政府都完全否认具有语言和文化特征的库尔德族的存在，直到1991年，时任总理的特米雷尔承认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的存在。本世纪前，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无法自由地使用库尔德语读写，直到2002年，以库尔德语接受教育和新闻出版的权利才被正式承认。

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标识

和公民权益同样受到限制，包括对使用库尔德语的限制、禁止库尔德语私立学校和书籍，并对库尔德人聚居区施行“阿拉伯化”。

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不同政府时期都爆发起义，遭到血腥报复，甚至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萨达姆政府的化学武器攻击。直到199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才阻止了对库尔德人的空袭。

三国的库尔德人也在不同时期各自组建了武装组织，对抗所在国政府。1978年改名成立的“库尔德工人党”在1984年转型为武装组织，在阿卜杜拉·奥贾兰的领导下军事对抗土耳其政府，被后者认定为恐怖组织。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了当地库尔德人寻求自治的军事运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库尔德人2012年成立“人民保护部

队”，2015年组建了包含“女子护卫队”在内的“叙利亚民主军”。

不幸的是，勇敢的库尔德人在三国谋求民族利益的过程中，都成为地区和域外国家政治角力的棋子。1999年，在土耳其的威胁和伊朗的干预下，叙利亚驱逐了奥贾兰。2003年，伊朗整体切断了与“库尔德工人党”的联系。在伊拉克，尽管库尔德人于2005年基于新宪法实现了自治，但2017年的“独立公投”却未获国际认可，而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自治模式在叙利亚已经被巴沙尔政府明确拒绝……

至于现在成为国际焦点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他们虽然在抵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仍被美国“背后捅刀”。至此，库尔德问题愈发成为影响地区关系演进的重要因素。但遗憾的是，库尔德人除了大山，没有朋友。



7月9日，一群加入库尔德武装的伊朗库尔德妇女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个军营参加训练。视觉中国

库尔德女兵：沙漠中的“战地玫瑰”

■本报记者 刘 畅

“明天，我们将投入战斗。我希望这是一场胜利之战，因为我们无路可退，必须于战火之中拯救我们的同胞。”这是一部名为讲述库尔德女兵的纪录片《古丽斯坦：战地玫瑰》中的一句台词，镜头中的女兵在讲出这段“战争宣言”时，眼神从柔和逐渐转为坚定，一种视死如归的坚定。

保家卫国的铿锵玫瑰

和很多国家在和平时期会评选“最美女兵”不同，面对战争现实威胁的库尔德女兵是没有精力去注重红妆的，对她们而言，女兵就是个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过一个名叫索尼娅·哈马德的摄影家深入叙利亚北部，近距离观察这群女兵后留下的印象：“我见过许多库尔德女兵，但是却很难感受到她们的女性特征，这种印象让人震撼，她们和男生一样，一起训练，即使平时也始终端着枪。她们不苟言笑。”

《古丽斯坦：战地玫瑰》的导演萨恩·阿基尔在接受《全球记者》采访时

也讲述了她与库尔德女兵朝夕相处两月有余的观察：“因为语言相通，她们对我很友善，但无论如何，都能感受到她们身上天生的使命感，那种为拯救同胞而义不容辞的天性。”阿基尔称，尽管没有官方统计，但根据她的观察，库尔德军队中有30%到40%都是这样的女性，“她们是深山和沙漠间的战地玫瑰”。

无论是哈马德还是阿基尔，她们都是库尔德人，从小跟着家人辗转移民，先到土耳其，然后到欧洲或者北美。如今她们回到这片动荡之地，通过不同方式记录下这段民族抗争的历史，和历史画卷上的一个个鲜活个体。

在哈马德的笔触下，刻画了一个名叫迪林的女孩。2015年哈马德与迪林相遇时，这个女孩才19岁，是库尔德女子护卫队(YPJ)的一员，已经同伊斯兰国战斗了3年，而且有一半时间是在前线度过的。据称，迪林在战争中受过伤，家人也不愿意她上战场，“但我必须继续战斗”。迪林说，队伍中很多都是同龄的女孩，有些是父母送进来的，有些父母不同意，自己逃跑进来的，“在护卫队，我们建立了‘深厚且真诚的关系’，亲如姐妹”。

哈马德说，这些女孩完全看不出才

十几岁，远比她们的真实年龄要成熟许多，这种特点还体现在她们超强的战斗力上。2014年8月，正是这群女兵解救了数千名遭“伊斯兰国”围困的雅兹迪人。福克斯电视台当时在采访她们时称，虽然那些极端分子不愿意跟女人打仗，因为他们觉得被女人杀死，是没法进天堂的。但更重要的是，就实力而言，他们也不如这些女斗士。

成功对战“伊斯兰国”已经被写进了功勋簿，如今更重要的威胁是来自出兵叙利亚北部的土耳其人。据悉，一支约由3000名库尔德女兵组成的部队已经抵达前线，准备和土军决一死战。

高声呐喊女性的解放

除了保卫家园的现实诉求，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库尔德女兵与土耳其势如水火的重要原因。自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社会逐渐走向宗教保守主义，总统埃尔多安一直要求女性应该回归家庭，他还曾敦促每个土耳其妇女都至少生3个孩子。政治对家庭和婚姻的干预对作为土耳其第四大民族的库尔德人产生了影响，据哈马德称，父权的压迫在库尔德人中间屡见不鲜，

童婚、一夫多妻、性暴力对库尔德女性犹如家常便饭，与其结婚，很多女孩最终选择了参军，对她们而言，参军使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自由的滋味。

据CNN报道，许多女兵都是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阿卜杜拉·奥贾兰的追随者，她们认为妇女解放理念深深地印刻在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中。

在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仅仅9年之后，该组织就举行了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提出“所有人的解放中必须包括妇女解放”。

如今无论是伊拉克还是叙利亚的库尔德自治区，法律都要求政府机构中妇女的比例占3到4成，这一比例与军队中的女兵占比大致相当。2013年，叙库武装成立了一支与人民保护部队(YPG)相对应的娘子军——女子护卫队。这支队伍成立以后，由于致力于女性解放，吸引了阿拉伯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等民族的女性加入，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或许正如阿基尔所言，这群堪称“战地玫瑰”的库尔德女兵，为国家存亡而战，却成为自身命运而斗，她们不应该被遗忘在深山与沙漠之中。



《时代》10月20日

如何让美国退出战场？

2019年，“后9·11一代”第一年有资格入伍，他们可能在阿富汗或全球反恐战争的其他战区服役。美国人的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比现在更持久的战争，将近20年的战争中近7000人死亡、超过5万人受伤。

鉴于最近美国针对伊朗、朝鲜的军事姿态，很容易想象它又“梦游”到哪些主要地区。

为了避免战争和平问题从国家话语的边缘带到中心。这样做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考虑撤军草案。

国会也对该草案重新产生兴趣，在2016年建立跨党派的国家军事、国民和公共服务委员会。今年1月，国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听证会，期间发布了第一份中期报告。



《大西洋》10月

谁是特朗普家族继承人？

在政治舞台上，特朗普控制了民族主义运动，以他的形象重塑共和党，并利用政治影响力为特朗普家族品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现在，对特朗普子女的分析不是在说谁会在特朗普死后继承“王位”，而是说这个家族在未来几年内将如何塑造这个国家。

特朗普家有三个孩子，从大到小分别是小唐纳德、伊万卡和埃里克。特朗普在参加竞选活动时选择让伊万卡成为焦点，而小唐纳德则被放在边缘位置。特朗普入驻白宫后，伊万卡宣布离开家族企业和她的时装品牌，从曼哈顿搬到华盛顿，成为总统助理。而小唐纳德和埃里克的任务是在父亲不在时经营家族企业，但小唐纳德仍具政治野心并投入到帮助特朗普连任的竞选活动中，而埃里克则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一位。



《今日印度》10月21日

勇敢新女性

印度201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一项最惊人的统计数字：10年间35至44岁的未婚女性增加了68%。这个数字证明：印度单身独立的女性阶层崛起，她们拒绝了社会对已婚生活的默认设置。

印度都市单身女性拥有一定的学历和职业，继而带来经济上的独立。她们变得孤独，但认为不需要用婚姻这个沉重代价去代替孤独，她们不需要用婚姻充实生活，也不需要生育孩子来实现做母亲的理想。

面对社会对她们的污名化或伤害，单身女性正聚集起来形成网络。例如，全国单身女性权利论坛敦促印度各州为收入低于税收起征点、未从任何其他来源获得抚恤金的女性提供每月3000卢比的补贴。

2018年5月，印度政府关于妇女的政策草案首次承认单身女性为一个独立实体，它谈到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以解决社会的孤立化。

行走世界

■水 心

一位在阿富汗工作过的朋友曾给我发过一张他在巴米扬省拍摄的照片：湛蓝的湖水像少女的眼睛般清澈，不远处的沙丘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沙丘和白雪的倒影映在粼粼湖水中，变得柔软而灵动。风景的纯净之美比起欧洲毫不逊色，又多了几分中亚的粗犷，亦柔亦刚。我很是惊讶，在国内关于阿富汗的报道里，几乎都是连篇累牍的战争、恐怖、血泪，这些消息早已让我建构起“这是一个被黑暗吞噬的国度”的印象，我无法再从漆黑之中想象出一片湛蓝。

阿富汗地处西亚、南亚和中亚交汇处，东西连接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南北沟通中亚草原和南亚次大陆，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其历来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至今仍承受着颠簸动荡的命运。阿富汗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即使在首都喀布尔，局势也十分不稳定。朋友说，“每天听到爆炸声是家常便饭，如果有两三天忽然安静了下来，那才叫人提心吊胆，因为这意味着恐怖分子在集

聚弹药，酝酿一次超大规模的爆炸。”但即便如此，在朋友的镜头和叙述中，那片土地仍然不时流露出市井的温度。

这里有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日常：由于日照时间长，阿富汗的瓜果含糖量很高，吃起来香甜四溢，到瓜果上市的季节，街头小贩还会在摊位上，用水果摆出富有波斯特色的形状，透露出一丝沉重生活里难得的巧趣。干果也十分丰富：葡萄干、桑葚干、无花果干、巴旦木，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内流行起来的“巴西松子”，就像夏威夷果并非产于夏威夷一样，这种松子也并非来自巴西，其主产区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它是西藏白皮松的种子，皮薄如纸，果实饱满，可以像瓜子一样嗑着吃。喀布尔有五颜六色的糖果店和地毯店，甚至还有花鸟市场，在狭窄的巷子里聆听鸟声起伏，如同跳动的音符在耳畔洒落，会让人暂时忘却这是一个战乱的国度。

受到朋友的启发，我也慢慢开始关注有关阿富汗更鲜活的讯息，其中有两件事印象十分深刻。

不久前，位于北京的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阿富汗女摄影师法蒂玛·侯赛因的摄影展“战争中的美”。在塔利班当政的年代，阿富汗女子成人后，都要被迫穿戴“布卡”，一种将女子从头到脚全部包裹起来、眼部也留有网纱纱帘的长袍。塔利班下台后，政府废除了这一强制规定，法蒂玛用她特有的镜头语言向世人呈现了脱下布卡的阿富汗女性形象：她们既同为阿富汗人，也分别为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等等，她们的服饰象征着阿富汗文化的多样性；露出面容意味着解放，也意味着新的困境：她们在“巴扎”中承受男性的凝视，也在世界各地重新思考“阿富汗女性”这一身份认同；她们握住汽车方向盘，在后视镜中的“小世界”

和传统束缚之外的“大世界”之间徘徊。

受制于技术设备，法蒂玛的照片像素并不高，我却能感受到光影和色彩中喷薄而出的言说力量，她们不再单纯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客体，而在表达的过程中尝试走向主体。更让我深受启发的是，照片中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价值冲突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民族中，她们的困惑和思考不仅指向战争，也指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共有的生存和表达困境。这是一场展览，更是一场祛魅：在对自身价值的探索之路上，阿富汗女性和我们有多么共同的连接。

不当代摄影师帕武曾重走玄奘西天取经之路，在记录这趟旅程的作品《皓月当空》中，帕武讲述了一个他在巴米扬省听到的动人故事：塔利班掌权时，为炸毁巴米扬大佛，曾强迫许多哈扎拉人爬上大佛安置炸药。哈扎拉人多信仰伊斯兰教，但许多人在是大佛的影子下长大